

深耕臺灣：2013-2015 年農業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Cultivating Taiwan: Reflections o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aiwan, 2013-2015

李力庸 (Lee Li-yung) **

一、前言

農業是指利用自然資源、農用資材及科技，從事農作、森林、水產、畜牧等生產、製銷及休閒之事業。因此，本文以農、林、漁、牧的生產與加工運銷作為討論對象，兼論農村社會與文化，其他與農業相關的土地租佃、灌溉水利問題，囿於篇幅而不討論。論文的蒐集乃參考《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13 年度》、《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14 年度》及《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15 年度》，在臺灣可閱讀到的專書及論文。

農業反映拓墾成果，農業史早期與開發、聚落、家族、商業、區域發展、殖民統治與治績議題聯結，為臺灣史研究的基礎。2013 年是農業史的豐收年，共有專書 8 本、專書與期刊論文 29 篇，學位論文 5 篇。2014 年專書 2 本，專書與期刊論文 20 篇，學位論文 4 篇。2015 年專書 4 本，專書與期刊論文 11 篇，學位論文 8 篇。論述時間從過去集中日治，快速推向戰後。單一作物在地毯式的書寫後，發表速度稍微減緩，另在科學、知識建構、貿易與政治、社會上有更多的表現，反映了臺灣農業發展的多元面向。因此，本文除了史料、工具書，在專論部分將三年來的論文歸納為農、林、漁、畜牧業，糧食與農產貿易，知識的建構與推廣，組織、政治與社

會等五個主題做一回顧與評述。

二、史料編譯、工具書

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在 2012 年發行了《臺灣農會史》，為了民眾查考方便，隔年出版《臺灣農會大事年表》，整理了 1840 年到 2013 年農會的大事，輔以農會簡史與名詞解釋，珍貴的圖像照片，雖然屬於工具書，但有文獻價值。¹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編年時間始於鴉片戰爭，乃將農會放在世界合作運動史來觀察。

許賢瑤過去分析過不少臺灣分館所藏的日治時期臺灣茶業資料，2013 年再譯介平尾喜壽的〈臺灣茶業實況調查報告〉，內容包括淡水茶葉實況與烏龍茶製造方法，買賣過程等。該報告為平尾喜壽在 1886 年接受日本中央茶業組合委託，到臺灣、中國、錫蘭、印度考察的調查報告，為目前可以看到的日本最早之臺灣茶業調查報告。從這份資料可以瞭解淡水是當時茶葉的集散地，茶園也已經擴展至松山、南港、汐止、暖暖、基隆、板橋、新店、區尺，臺灣僅製烏龍茶，茶農在自家土地種茶，粗製茶賣給稱為大庄的山上茶販，精緻後再賣給外商。²

口述訪談方面，國史館在 2005 年開始推動「戰後臺

* 本文係 105 年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14-2015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之論文修改而成。承蒙與談人張靜宜教授及匿名審查者惠賜寶貴建議，謹此特致謝忱。

** 作者為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1 胡忠一，《臺灣農會大事年表》（臺北：農訓協會，2013）。

2 平尾喜壽著、許賢瑤譯，〈日本最早的臺灣茶業調查報告〉，《臺灣史料研究》41（2013.6）：92-104。

灣出類拔萃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透過訪談方式，蒐集、記錄戰後以來臺灣各領域菁英分子的成功經驗。薛月順訪談記錄整理的〈臺灣漁業人物口述訪談：余正雄先生口述訪談錄〉，紀錄了余正雄透過蔣孝文引介海軍總部相關人士，成立漁業公司，將廢棄砲艇改裝成漁船，並以漁船送游擊隊到大陸從事秘密工作的過程。³另一本《臺灣漁業推手：闕狀狄訪談錄》，由於闕狀狄對漁業的參與面向非常廣，曾任職於經濟部漁業增產委員會、臺灣省農林廳漁業管理處、農復會與民間水產相關企業，提供了臺灣漁業機構，近海、遠洋、養殖漁業的發展，各種漁法，國際漁業合作，漁港與設施，漁會以及民間水產貿易機構等資料，⁴對於戰後鮮為人知的漁業政策研究相當有幫助，這兩本訪談記錄在遠洋漁業及外交上可相互參照閱讀。

三、農、林、漁、畜牧業

日治時期的資料豐富，加上數位化成果日新月異，2013-2015年出版之農、林、漁、畜牧業史的研究仍以日治時期作品為多，議題包括農業近代化，米、糖與農家經濟之重新檢討，米糖經濟的區域觀察、總力戰下的農林資源等。除了米、糖、茶外，大麥、小麥、罌粟、花卉、柑橘、香蕉、咖啡等雜糧、園藝作物受到關注，相當多的寫作與地方產業、社會文化結合，反映休閒農業的蓬勃發展。近年來，學界對海洋史的倡導不遺餘力，漁業的研究隨之興起，關注焦點在東石魚塢、漁業移民、資金外援、虱目魚、土魷魚。相對之下，林業與畜牧的學術論著較少，林業研究成果有林業研究回顧、林業貿易網絡與南投林區管理處發展史，畜牧業的焦點在養豬、牧牛與防疫問題。

(一) 農業

葉淑貞的《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以「新經

濟史」(New Economic History)的研究方法，運用統計分析，重新思考舊論。該書包括「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農家所得水準之變遷、農家儲蓄及消費水準之變遷、農家商業化程度之變遷、蓬萊米種稻作普及之因素等課題。在農家所得水準分析上，作者得出因為綠色革命，每甲地農業收入大幅增加，雖然1930年代初期經濟不景氣，米價下滑幅度超過工資，但卻小於豆餅價格的下滑，使農家可以多用肥料，農家每人可支配所得在1930年代達到最高，戰後初期則下滑至最低。在商品化上，米作農家的商品化程度低於蔗作與茶作，而1918-1921年米作農家的市場投入比率相當低。在生產技術上，1929年後在來米的肥料投入量大增，拉近蓬萊米與在來米的生產型態。蓬萊米高額利潤與漸趨減少的風險，使其在1925年推廣效率就較在來米高。⁵但作者也接著提問：要達到這種效率一定有一套完善的技術推廣，到底這套制度的內容是什麼？如何運作？如何設計？這些問題或可在史學論著上得到解答。

張玲瑜「日治時期的臺灣農業：以米穀生產和砂糖生產為探討中心」，討論臺灣總督府為了要發展農業，進行土地調查事業，藉著租佃慣例改善事業，業主和佃農之間的關係逐漸穩定，米、糖生產技術改良與商品化，以及之後所產生的米糖相剋問題。⁶但這些課題在歷史學界多已有專文討論。林敏容的〈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台湾米の改良〉所設定的在來米與蓬萊米改良過程、農會角色、品種變化等問題，⁷前人著作也皆已有論述。如果能夠從在來米與蓬萊米品種改良與技術的動機、結果，進一步檢視兩種改良在農業史上的價值，則可突破目前研究上的思維與成果。

「北麥南稻」為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特徵，反映了米、麥兩大糧食作物在中國地理空間的分布情況與植物生長的天然條件及限制。吳憶雯的〈華南糧作的配角——以古籍史料所現清代臺灣的麥作為論述中心〉透過清代臺灣的史籍文獻耙梳、地名考證等工作後，發現大、

3 薛月順，〈臺灣漁業人物口述訪談：余正雄先生口述訪談錄〉，《國史研究通訊》4（2013.6）：121-139。

4 薛月順，《臺灣漁業推手：闕狀狄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15）。

5 葉淑貞，《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6 張玲瑜，「日治時期的台灣農業：以米穀和砂糖生產為探討中心」（新北市：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7 林敏容，〈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台湾米の改良〉，《南島史学》81（2013.11）：110-193。

小麥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隨著漢人移民的原鄉習慣，大、小麥曾在安平一帶扮演與稻米輪作的配角功能。⁸

清代臺灣米糖呈現南糖北米的版圖，彰化正位於米糖交界南區，米糖經濟的興衰讓這塊土地產生哪些變化？莊天賜的〈日治明治後期彰化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認為臺灣總督府糖務局為傳統糖業演進到新式製糖業提供良好誘因，也開啟彰化地區新式製糖業發展的新契機。由於1907年間南部平原地帶幾乎成為新式製糖會社的勢力範圍，而改良糖廊的設立重心北移到濁水溪以北，彰化成為改良糖廊設立最多的地區，為新式製糖鋪路。彰化除八卦山麓和西南海岸外，全數進入新式製糖的版圖，為大正晚期的「米糖相剋」埋下伏筆。⁹張素玢的〈「後米糖」時代的農業盤整——以濁水溪沖積扇平原為中心的探討〉討論1960-2010年濁水溪沖積扇平原農業的變化，指出1960年代後因為蔗糖失去國際競爭力，稻米價格低迷，米糖經濟急轉直下。從稻作與蔗作釋出的農田漸漸轉變成蔬菜、水果與園藝作物，但互有版圖，1980年代之後，該區農產在國內市場的供銷上已經佔有重要地位。作者除了討論其盤整過程，也點出農業式微之際，常是工業向農業資源侵奪之時。¹⁰

在臺灣農產史上，有諸多作物看似微小，但在戰爭年代中扮演特殊角色，由於其階段性任務高，有的曇花一現，這類特殊作物種類多，也容易被忽略。張靜宜的《日本統治後期臺灣「特殊農產物」增產之研究（1934-1944）》有系統地將日治後期各種特殊農產物的增產做一整理，指出臺灣總督府在統治初期已經開始注意熱帶作物與試作；1934年為了取代米作，鼓勵自給自足的作物種植；1939年的重要作物十年產計畫中，又以軍需作物為要；戰爭末期，再回到以糧食作物為主的增產。作

者闡述各種特殊作物在上述時代中的倡導情形，再以纖維作物與澱粉作物為討論對象，分析其功能，在不同時期中的運用、地位的演變、品種變化、推廣機關與機制，生產區與生產結果。作者進一步檢視有的作物其實不具「適地試作」，但農地利用卻必須配合改變，¹¹點出作物必須擔任的特殊角色。

茶業方面，林家成「清代臺北地區產茶地的社會與經濟——以THDL所藏契約文書為中心」從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國家文化資料庫等所藏清代臺北地區884件茶園契約為對象，輔以GIS（地理資訊系統），從舊地名探討清代臺北地區產茶地的起源分布，將契約與古地圖、史料文獻、地方志、學術性文章等資料相互配合，分析臺北地區產茶家族的分家與繼承，茶園分配與價格，尤重汐止的分析。論文重新整理臺北地區的茶葉契約文書，檢視過去茶葉研究論點，發現臺北最早出現的茶園契約可以從過去舊說的乾隆末年，往前溯及乾隆11年。¹²翁世強「花蓮茶產業之發展與變遷」則以花蓮鶴岡村、舞鶴村一北一南的茶產業基地，比較其歷史變遷。¹³

鴉片很早就是學術界熱衷的話題，臺灣在日治時期的專賣體制與鴉片的社會影響已有研究成果。罌粟的供應關乎鴉片專賣與行政管理，總督府是否嘗試在臺灣自產？2014-2015年有兩篇論文對罌粟的栽植背景與推廣提出觀點。蔡承豪的〈探查、擬策與嘗試：日治前期臺灣罌粟的調查與經營〉，指出因為鴉片的國際原料市場變動不定，臺灣總督府為了穩定貨源，在臺灣展開調查，並在各地推動種植。罌粟栽植最終因氣候、土質與蟲害等環境因素，推廣效果不佳等因素而停止。¹⁴栗原純在次年發表〈臺灣總督府的鴉片專賣政策——關於專

8 吳憶雯，〈華南糧作的配角——以古籍史料所現清代臺灣的麥作為論述中心〉，《中正歷史學刊》18（2015）：33-65。

9 莊天賜，〈日治明治後期彰化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彰化文獻》20（2015.10）：33-59。

10 張素玢，〈「後米糖」時代的農業盤整——以濁水溪沖積扇平原為中心的探討〉，《近代東亞中的臺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2013），頁60-84。

11 張靜宜，《日本統治後期臺灣「特殊農產物」增產之研究（1934-1944）》（臺北：翰蘆圖書公司，2013）。

12 林家成，「清代臺北地區產茶地的社會與經濟——以THDL所藏契約文書為中心」（彰化：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13 翁世強，「花蓮茶產業之發展與變遷」（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4）。

14 蔡承豪，〈探查、擬策與嘗試：日治前期臺灣罌粟的調查與經營〉，《臺灣史料研究》43（2014.6）：25-60。

賣局的罌粟栽種〉，除同樣指出原料的國際市場供應問題，另認為降低外匯，尋求稻作間作等也是栽植罌粟的因素。至於栽植失敗，作者提出栽植罌粟之土地租金、人工與肥料等合計起來較海外輸入與內地生產昂貴等因素。而 1937 年後，隨著日軍占領華南、東南亞，專賣局也於占領地栽植罌粟，製造煙膏與嗎啡，展開新的經營事業。¹⁵

日治時期水果栽植的科學化、商品化，很快吸引學者的目光，清代水果歷來乏人問津。然王藝都「清代臺灣水果研究」，運用一般熟悉的方志、熱蘭遮城日記，航海日記與長官書信集，加上清代官宦文士的詩歌文集，討論二百年水果在臺灣的在地化過程。作者回顧了荷、鄭時期移入臺灣的水果種類與途徑，從氣候、生長月份等面向，分析外來物種的在地化，水果的食用、祭祀與社會禮俗等功能，另從康熙、雍正、乾隆的奏摺看皇帝對臺灣水果的評價。¹⁶ 作者雖然大多運用傳統史料，但提供新的觀察點。日治時期，水果種植進入新階段，新竹之柑橘在水果產業佔有一席之地。曾立維的〈日治時期新竹地區的農會與柑橘業之推廣〉闡述新竹州農會與柑橘產業發展之關係，作者指出水果在清代方志中未被特別凸顯，到了日治，因為新竹州的傾斜地利用，找出適地適種的品種，加上農會推廣，才使柑橘成為新竹的產業與形象代表。¹⁷ 兩篇論文一則呈現出水果在清代臺灣庶民社會中的生活功能；一則表現研發科學化與商品化的成果，不僅勾勒出臺灣水果的發展輪廓，也反映水果在不同時期的社會經濟意義。

花卉類的園藝作物是目前臺灣重要的經濟作物，亦為學界的新焦點。張慧娟「花開物語——田尾花卉產業

的形成與再造」指出彰化田尾花卉產業的形成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總督府認為園藝活動具穩定精神之作用，故藉推廣日本精神指標的「菊花」柔性文化，潛移默化臺人的認同感。田尾因水利、交通建設與內地移民村的設立，農業呈現多元化發展，花卉產業逐漸萌芽。¹⁸ 張慧娟、莊世滋〈臺灣日治時期菊花文化政策推展之探討〉另分析仕紳、株式會社與菊花文化推廣的關聯性。¹⁹

（二）林業

張家綸〈臺灣林業史的回顧與展望〉指出近幾年林業論點上擺脫帝國剝削論，轉以林政現代化角度切入。但政策與社會的研究成果較為不足，臺灣各區域以及殖民地林業史比較都有研究的空間。²⁰ 游棋竹「日治時期臺灣林業經濟研究兩面向——貿易網絡與經營」指出臺灣山區的森林資源在完成土地調查後，雖引進日系資本，但因為原住民問題，無法成為獨占，反而以國家資本（營林所）形式進行產業經營。以營林所為主的「官營販售中心」，使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在社會關係上構成民間資本寄生在國家資本內成長的「公、私」或「官、民」特殊關係。²¹

莊世滋的《戀戀丹巒：南投林業印記》敘述日治時期的巒大林區管理處至 1989 年與埔里林區管理處合併改組後之歷史發展，35 位耆老的訪談記錄為其重要成果，內容涉及諸多專業技術，替林業保留珍貴史料。²²

（三）漁業

在養殖漁業上，楊彥杰〈百年魚塢：清代東石蔡氏在臺灣的魚塢經營〉以清代泉州東石蔡氏在嘉義布袋嘴

15 栗原純著，洪幸音譯，〈臺灣總督府的鴉片專賣政策：關於專賣局的罌粟栽種〉，《第八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頁257-297。

16 王藝都，「清代臺灣水果研究」（臺南：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17 曾立維，〈日治時期新竹地區的農會與柑橘業之推廣〉，《臺灣文獻》64: 3 (2013.9): 185-232。

18 張慧娟，「花開物語：田尾花卉產業的形成與再造」（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19 張慧娟、莊世滋，〈臺灣日治時期菊花文化政策推展之探討〉，《彰化文獻》20 (2015.10): 61-85。

20 張家綸，〈臺灣林業史之研究回顧與展望〉，《臺灣風物》63: 4 (2013.12): 121-140。

21 游棋竹，「日治時期臺灣林業經濟研究兩面向——貿易網絡與經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

22 莊世滋，《戀戀丹巒：南投林業印記》（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5）。

的魚塭經營進行研究，認為當時魚塭經營有多種股權形式，包括長期合股，在此基礎上演變的塭底份（大稅），塭佃份（小稅），現耕塭（浮）份等。²³ 作者使用蔡氏的家族文獻，包括族譜、契約、書信、帳本及各種商業文書等，對魚塭歷史提供一個實證研究。

林玉茹的〈殖民地的產業治理與摸索——明治末年臺灣的官營日本人漁業移民〉分析 1908 至 1911 年間，臺灣五廳六港的地方官廳發動官營漁業移民事業，藉引入日本移民作為示範，促使臺灣人產生競爭心理，以改良臺灣沿海漁業發展。但因地方廳倉促成軍、總督府隨後配合展開，除東港移民因地利人和，成績較佳外，其餘五港成效不彰。作者指出地方廳到殖民政府漁業治理策略的差異，表現出當時的漁業改良仍處於摸索及嘗試錯誤的統治階段。移民的失利使總督府終止該事業，但也開始大幅擴編水產經費，漁業的施策轉趨積極，逐漸發展近海漁業。²⁴ 本文不僅分析了鮮少被注意的漁業移民始末，在臺灣移民史上補充了另一個與東部官營移民不同類型的移民型態。

過去認為漁業為臺灣產業的邊緣，但隨著文獻的挖掘，以及近年諸多學者的研究，漸漸證實臺灣漁業在日治時期已有長足進步。例如蔡昇璋〈日治時代臺灣漁業的發展與變遷——以臺南州東石郡為例〉指出獎勵建造動力漁船政策的落實，港口改築的配套，使東石港成為專門從事鯊釣漁業的根據地。東石自身特殊的地理環境，發展出以虱目魚與牡蠣為主的養殖漁業。²⁵

郭忠豪〈技術、品味與土魷魚：大高雄土魷魚的歷史變遷與品饌文化〉，從歷史文獻中討論土魷魚在清代的捕撈技術，並利用口訪書寫土魷魚在大高雄的消費

文化。研究指出，清代的土魷魚紀錄以澎湖地區為主，臺灣捕撈與魚汛紀錄有限，日治時期才陸續在沿海出現漁場。高雄州哈馬星的築港，以及戰後高雄前鎮港在硬體設施與漁船配備的完善，大量澎湖移民遷徙到高雄謀生，在漁船公司擔任要職，皆促進大高雄土魷魚捕撈行業的蓬勃發展。哈馬星漁港沒落後，前鎮漁港取而代之，成為臺灣土魷魚捕撈的最大漁港。²⁶ 張郁倫「臺灣虱目魚文化之探衍——以臺南地區為例」除從臺灣北肉南魚的食粥習慣來討論魚肉的副食品地位，也分析了西南沿海的捕撈技術簡陋，漁獲不高，促使內陸的養殖漁業日益蓬勃，臺南內海淤積成為新生海埔鹽地，居民將之拓墾為鹽田或魚塭。魚塭型態由清代看天塭，演變至 1980 年代的深水式淡、鹹水魚塭，產量傾銷全臺。²⁷

臺灣的草蝦在 1987 年的產值曾佔養殖業的三成，高居農產外銷之首位。薛月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與臺灣水產養殖業的發展〉分析美援結束後，洛氏基金會對臺灣水產養殖業的技術與人才培育上的貢獻，基金運用在草蝦養殖試驗上成效卓著。洛氏基金會所協助成立的東港養蝦中心於 1971 年改制為水試所東港分所，提供東南亞和非洲國家農業人才的訓練課程，為國際知名的水產研究機構。²⁸ 蔣敏全〈產業記憶與地方文化：以花壇鄉魚苗寮魚苗養殖為例〉運用田野調查、口述資料與親身經驗，以產業記憶角度淺談淡水魚苗養殖歷史、魚苗寮魚苗養殖的濫觴、興盛與沒落。²⁹

在漁港方面，許焜山「基隆八斗子漁村與漁業發展與變遷」運用口述採訪和田野調查方法，討論具二百年歷史的八斗子漁村漁業發展過程。作者整理出屬於當地十九種漁撈方法、作業漁法、漁船和漁具的演變，認為

23 楊彥杰，〈百年魚塭：清代東石蔡氏在臺灣的魚塭經營〉，《臺灣研究集刊》2013.6: 69-82。楊彥杰著，小嶋祐輔譯，〈百年的養殖漁場：清代東石蔡氏による台湾での養殖漁場経営〉，《近代台湾の経済社会の変遷：日本とのかわりをめぐって》（東京：東方書店，2013），頁359-403。

24 林玉茹，〈殖民地的產業治理與摸索：明治末年臺灣的官營日本人漁業移民〉，《新史學》24: 3（2013.9）：95-133。

25 蔡昇璋，〈日治時期臺灣漁業的發展與變遷——以臺南州東石郡為例〉，《嘉義研究》7（2013.3）：59-120。

26 郭忠豪，〈技術品味與土魷魚：大高雄土魷魚的歷史變遷與品饌文化〉，《高雄文獻》4: 1（2014.4）：29-54。

27 張郁倫，「臺灣虱目魚文化之探衍——以臺南地區為例」（高雄：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臺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28 薛月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與臺灣水產養殖業的發展〉，《國史館館刊》36（2013.6）：99-139。

29 蔣敏全，〈產業記憶與地方文化〉，《彰化文獻》20（2015.10）：165-187。

焚寄網漁業奠定了八斗子漁村發展的基礎；棒受網的發明展現八斗子漁民的捕魚天賦，使漁撈技術產生劃時代改革；一支釣帶給八斗子漁民發展永續漁業的契機。不過，氣候暖化導致漁業資源日漸枯竭，諸多漁撈技術消失。八斗子漁港的新建適逢漁業衰退，預期的漁業轉型落空，經濟蕭條造成漁村日漸沒落，傳統漁村文化日漸消失。³⁰

(四) 畜牧

吳文星〈長嶺林三郎與近代臺灣牛畜事業的展開〉討論長嶺林三郎在恆春的牛畜研究與推廣關係。雖然臺灣早期已經引進相當的歐洲牛種，但長嶺林三郎認為勞動、乳用皆宜的印度牛不輸歐洲牛，也使得恆春種畜場成為印度牛改良中心。³¹ 養豬業一直是畜牧業的重心。曾純純、朱有田〈日據時期臺灣農村養豬業〉，指出清代豬的飼養多為傳統農業副業，並採中國傳統的餵水飼養。臺灣總督府引進西洋種豬，開拓飼料供應，實施豬種登錄，使臺灣豬朝向專業與現代化畜牧方式發展。在族群方面，閩南人傾向追逐市場最高利潤，而客家人傾向維持傳統穩定的生活型態。³² 兩位作者在同年接著發表〈臺灣本土黑豬產業在南部六堆地區的傳承與發展〉，以屏東縣內埔鄉毛豬產銷班為個案，從養豬產業的歷史發展過程，探討本土黑豬（能與桃園黑豬遺傳特徵明顯區隔者）和六堆聚落養豬特性，文化意涵與產業結構，說明臺灣本土黑豬能在六堆聚落持續飼養的結構性因素。1997年口蹄疫發生前，本土黑豬係承襲中國傳統「清道夫飼養」之餵水養豬文化。臺灣陸續爆發口蹄疫情後，內埔鄉客籍農民改變養豬方式，摒棄外來豬種，選育本土黑豬，結合傳統與現代的養豬方式，順利渡過口蹄疫重創、開放豬肉進口及國際穀物價格高漲等嚴峻考驗，另一方面，則讓臺灣本土黑豬接受保種復育。³³

沈佳姍〈牛豬並濟——日本時代臺灣獸疫預防的轉向〉從制度史的角度說明獸疫免疫制度和機構在臺灣各階段的轉變，作者指出總督府的防疫策略乃由牛而豬而家禽，自產業防疫到協助帝國外拓發展的轉換過程。³⁴

四、糧食與農產貿易

糧食問題的討論均衡地分布在各時期。從荷蘭與西班牙在亞洲各自的糧食解決方式，比較其貿易競爭與飲食習慣的適應；清代臺灣與中國的米穀貿易；檢討行政長官公署的糧食管理與失敗原因，戰後初期與1970年代間的糧食生產。其他的農產貿易是關於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生豬交易；泰號益的貿易中，臺灣米與日本海產的跨海交換；以及臺灣與沖繩之間的米穀、豬隻交易。值得注意的是，米穀交易與糧食問題討論跨越了三百年，農產交易多討論臺灣與海外的流通關係，表現出臺灣農產品的商品性格。

(一) 糧食與糧政

在菲律賓活動的西班牙人與在臺灣的荷蘭人如何解決他們的糧食問題？黃婉琪「食米抑或食麵——西、荷於馬尼拉、大員的糧食適應研究（1571-1683）」指出西班牙人無法從菲律賓的生產滿足生活需求，但從中國福建與日本九州海商可以獲得麵粉供應，不僅維持飲食習慣，透過這些商人的力量，以菲律賓作為轉口貿易的基礎，從而豐富了三角貿易網絡。而臺灣的荷蘭人在來臺之前已經在爪哇、巴達維亞習慣了米食，故利用中國、日本、暹羅等地的米商供應稻米，但同時也在臺灣種植稻米。西班牙人與荷蘭人的飲食習慣間接影響了大航海時代的貿易網絡。³⁵

清代開港之前，出口的產業以米、糖、樟腦為大

30 許焜山，「基隆八斗子漁村的漁業發展與變遷」（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31 吳文星，〈長嶺林三郎與近代臺灣牛畜事業的展開〉，《臺灣學研究》18（2015.12）：1-16。

32 曾純純、朱有田，〈日據時期臺灣農村養豬業〉，《臺灣研究集刊》125（2013.2）：55-64。

33 曾純純、朱有田，〈臺灣本土黑豬產業在南部六堆地區的傳承與發展〉，《臺灣史研究》20：4（2013.12），：135-177。

34 沈佳姍，〈牛豬並濟——日本時代臺灣獸疫預防的轉向〉，《屏東文獻》18（2014.12）：255-298。

35 黃婉琪，「食米抑或食麵——西、荷於馬尼拉、大員的糧食適應研究（1571-1683）」（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4）。

宗，但清中葉的臺米是否只能自給自足，或在 1870 年之後自給不足？承襲謝美娥、林文凱的討論後，黃順進〈19 世紀中葉臺灣的米穀貿易：以進出口數據為中心的探討〉對臺米銷往大陸的議題再申論，作者以美國領事報告所附帶的「1855、1856 年臺灣產品出口表」分析，1855 年臺米出口量有 80 萬石，其出口金額佔出口總值的 57.6%，顯示稻米產銷是當時經濟命脈。1860-1870 年的臺米貿易，以英國駐華領事貿易報告及臺灣海關統計資料，得出臺米出口量近 60 萬石。雖然彼時臺灣人口增長、米消費量增加，臺米輸出量逐漸減少，但臺灣開港後仍有大量的臺米出口。³⁶

日軍占領臺灣初期，臺灣各地掀起抗日運動，日軍如何解決其米糧與馬糧的補給問題？朱德蘭〈日軍武力占領臺灣初期的米糧與馬糧（1895-1905）〉的研究指出：1902 年以前，日軍補給品由陸軍省補給場辦理，1902 年以後改由臺北陸軍經理部負責。日本政府為了防止圖利廠商承辦公務用品，制訂了採購法，隨著日軍對臺灣米需要的增加，也給臺籍米商參與投標機會，軍馬飼料多由日商得標。臺灣抗日者的糧食來自向農民徵收及村民出售、捐獻，相對弱勢。³⁷

在戰後糧食方面，過去認為臺灣米輸出大陸，造成糧食不足，物價上漲而造成二二八事件。蘇瑤崇的〈戰後臺灣米荒問題新探（1945-1946）〉以《館藏民國史料彙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臺活動資料集》及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等一手史料，指出戰後初期長官公署並未將大量糧食運往中國，但行政長官公署無能力，也不願意延續總督府的管制政策；在廢除米穀管制政策後，封存大批囤糧，導致米穀消費市場急凍，形成米荒。過去雖然從糧食問題解釋二二八之成因，但缺糧原因仍然費解，本文以電文、統計數字等資料抽絲剝繭，提供更多元的思考。曾獻緯的〈戰後初期臺灣的糧食管制（1945-1949）〉則分析當時民眾不願意配合行政長官公

署的徵收政策的原因，並突破臺灣內部觀察的視角，與中國的糧食問題一併討論。他指出人民不願配合總收購總配給的原因在於國家只配給糧食給公教人員，黑市高出收購價許多。解決無法運作的徵收與配給制度的方式是以民調來取消糧食統制，減輕政治責任。更進一步指出由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貿易管制政策上存在結構性的矛盾，因而對走私行為的界定看法不同，形成法律規範的模糊地帶，反而有利於兩岸的走私。因此，省政府雖然掌握臺灣糧食資源，卻大量輸出糧食至中國。³⁸ 這兩篇論文在糧食流通管制上從不同分析角度，可以相互參考。

薛月順的〈農復會與臺灣的糧食增產（1948-1960）〉，指出臺灣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增產是戰後初期農業的工作重心。農復會與農林廳等各級農政機構密切配合，經過數年的復原工作，多項農作物產量逐漸增長，並超過日本統治時期的最高生產紀錄。1953 年農業四年經濟建設計畫實施，至 1960 年第二期計畫結束，農復會透過技術的支援與經費的提供，推動增產。當時的農事從業人員擁有對臺灣特殊環境發展獨特技術的能力，這樣的特點在洋蔥與洋菇的生產過程中展露無疑。1960 年代之後盛行的各項農民收益等產銷制度的建立，亦於 1950 年代末期的增產經驗中逐步奠定基礎。³⁹

戰後，稻米除了提供軍精民糧，也是換取外匯的重要來源，故為重要的農業復原項目。而在多數農業生產資材匱乏下，水利是快速的增產方法。李力庸〈水與糧食：石門水庫興建前後桃園地區的觀察（1940-1970 年代）〉地方社會最初為了灌溉，力促政府興建水庫，但最後則以防洪、民生工業用水與發電兼顧作為爭取美援的設計。水庫完成後，稻作的糧食與商品價值日漸低落，農民對開發稻作水田產生猶疑，拒繳工程受益費，甚至脫離水利會灌區。儘管水庫灌區的農業灌溉面積不如預期，但單位生產量卻大幅提昇。在產業轉型之際，石門

36 黃順進，〈19 世紀中葉臺灣的米穀貿易：以進出口數據為中心的探討〉，《臺灣文獻》65: 2 (2014.6) : 160-197。

37 朱德蘭，〈日軍武力占領臺灣期間的米糧與馬糧（1895-1905）〉，《川勝守·賢亮博士古稀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13），頁987-1008。

38 曾獻緯，〈戰後初期臺灣的糧食管制（1945-1949）〉，《臺灣文獻》66: 3 (2015.9) : 52-102。

39 薛月順，〈農復會與臺灣的糧食增產（1948-1960）〉，《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臺北：國史館，2015），頁363-399。

水庫多目標的設計，加上桃園的地理位置，使其他功能快速展現出來。⁴⁰

(二) 其它農產貿易

曾品滄〈生豬貿易的形成：19世紀末期臺灣北部商品經濟的發展（1881-1900）〉指出19世紀後期，養豬是臺灣最普遍的家庭副業，也是當時臺灣最重要的商品。成本低廉、豬肉商品化、養豬有助於水稻作與旱作生產、民眾嗜食豬肉、豬肉為祭祀宴會重要食材等皆促使養豬副業興盛。開港後，臺北有通貨膨脹的現象，豬肉價格上漲；北部開港及成為臺灣政治中心後，農業生產體系變化，豬隻生產減少，因此北部從中國大量輸入生豬，形成興盛的兩岸生豬貿易活動。⁴¹

辛德蘭〈臺灣與日本之間米與海產品的交換：長崎華商泰益號的跨越海洋網絡（1901-1910）〉以長崎泰益號文書，針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臺灣米銷售日本，日本海產品銷售臺灣，分析泰益號建構跨洋貿易網絡之特色。而透過20世紀初臺灣在來米銷售日本本土的分析，作者認為「日治初期日資不曾注意於臺米出口，……一直到1925年後高漲的蓬萊米出口引起日資注意，方爭相進入米穀貿易，掌控外銷」、「日治時期臺灣對日貿易均由日本商人所掌握」等觀點應該重新思考釐正。⁴²辛德蘭另一篇〈日治時期臺灣與沖繩的貿易品——以稻米、生豬為例〉分析日治時期臺灣米銷售沖繩，沖繩豬銷售臺灣的貿易關係。從該文可以瞭解當時米穀貿易商社大致為日商集團，豬隻貿易則有少數臺灣商人。⁴³日治時期臺灣豬隻飼養有相當大的提升，沖繩的豬隻大量貿易的原因值得再探討。

五、知識的建構與推廣

農業知識的建構與傳播是這三年來的研究熱潮，論者開始討論品種知識書寫過程、反省殖民者推介農業科學的目的，包括害蟲的觀念與對治害蟲方法、原住民農業知識的轉型、高等農林學校的林學畢業論文、水產教育中的師資、帝國之間牧牛知識的交流、戰後農業推廣體制建立與稻作技術推廣。時間涵蓋清代到戰後，地域上延伸至美國在菲律賓的牧牛業。

蔡承豪的〈地方農識的書寫與呈現：以19世紀北臺地區稻米品種變遷為例〉以19世紀北臺灣各方志的稻種為中心，搭配清代檔案、日治時期的農事調查、報導、稻種圖鑑等，探討北臺灣的稻作經營特色，以及各種書寫紀錄分析。作者比對不同地方文獻的品種記錄，發現有漏載情形，但也並非一般認為品種乃輾轉抄錄，而是彙整地方知識後的成果。而清人的品種分類第一為直觀，後為種植收成，栽植田園等。在方志簡短品種書寫內容中，仍可表現出當時的土質、產量、品質、口感、價格與抗病性。對吾人瞭解清代臺灣農墾、地方因應人文及自然環境所產生的農業知識提供觀察面向。⁴⁴過去原住民的農業多被放在授產與集團移住的主題內討論，近年有較多的論文專對山地農業知識作分析。張耀宗的〈知識轉型：日治時期農業知識的轉變〉，分析原住民接受教育所的實科教育，日本人在部落推動農業技術後，探究傳統農業知識轉變過程。作者認為總督府的原住民農業知識與技術改造是一種部落的全面改造工程，其背後係出於穩定的殖民統治。新的農業知識與技術批著日本式的外衣，內裡依然有現代性的思維，是一種合理化運用農地的方式，因此山地水田耕作面積

40 李力庸，〈水與糧食：石門水庫興建前後桃園地區的觀察（1940-1970年代）〉，《近代東亞中的臺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8-57。

41 曾品滄，〈生豬貿易的形成：19世紀末期臺灣北部商品經濟的發展〉，《臺灣史研究》21:2（2014.6）：33-68。

42 辛德蘭，〈臺灣與日本之間米與海產品的交換：長崎華商泰益號的跨越海洋網絡（1901-1910）〉，《跨越海洋的交換：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193-244。

43 辛德蘭，〈日治時期臺灣與沖繩的貿易品：以稻米、生豬為例〉，《順風相送：中琉歷史與文化：第十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頁1-19。

44 蔡承豪，〈地方農識的書寫與呈現：以19世紀北臺地區稻米品種變遷為例〉，《師大臺灣史學報》6（2013.12）：3-51。

逐漸增加。定耕為部落的發展主軸，農業知識是教育所主要的學習課程，部落農業菁英也多由農業講習所而來。祭儀作物的小米依舊存在，呈現當時部落傳統與現代並存，知識轉型無法新舊截然而分，需長期實踐，才能找到適合落發展的知識。⁴⁵不過，山地定耕是否適合山地？水田化的績效是否如預期？過去，陳秀淳的山地水田化研究曾保持懷疑的態度，這部分有待再更多的研究證明。

18世紀中葉歐洲因著蠶微粒子病蔓延的破壞，打破了世界生絲貿易市場的平衡。隨著蠶病研究的突破，科學儀器進入並改變傳統蠶業生產模式。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藉由蠶業的建立與蠶病的預防引進了新的科學知識與儀器。林啟揚〈臺灣蠶業的現代化：以日治時期蠶病預防為起點〉認為雖然蠶業發展不如預期，但透過對蠶業的推廣與科技教育，程度上改變了臺灣人的科學知識觀念，且總督府對蠶病的預防與訓練，意外讓製種業有良好發展環境。⁴⁶呂紹理〈從螟蟲到螟害：近代臺灣農業害蟲及其防治〉指出「蟲害」觀念是從明治年間才產生，而且是農業科學化、都市化、商品化，以及國家富國強兵之下所建構出來的概念。日本殖民時期，「蟲害」發生的頻率和種類不斷增加，實因應用昆蟲學讓原本早已存在於臺灣的昆蟲轉為害蟲。殖民政府透過制度的力量，包括頒布害蟲預防法規，設立農業試驗場、植物檢查所以及害蟲巡視員等組織，試圖防堵壓制「害蟲」對農作造成的損失。1920年代以降，日本化學工業突飛猛進，臺灣的應用昆蟲學專家不遺餘力地介紹各式新農藥產品。不過，臺灣稻作仍維持人工密集性的除蟲方式，這是農村仍存有大量勞動人力所致，只有柑橘、瓜果等進入國際市場的農作物採取先進的劇毒農藥。即便如此，因為害蟲的觀念已生成，為戰後美援化學農業的進軍奠下基礎。⁴⁷

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是日治時期臺灣唯一的

高等農林教育機關。謝明如的〈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之造林學研究——以林學科學生畢業論文為中心〉利用該校學生的畢業論文探討其造林學之研究趨勢，歸結出該校造林學以臺灣為主，將臺灣作為基地發展熱帶林業，課題與研究方法受國家、指導教授與社會需求之影響。早期金森真吉的指導論文著重考察與實用造林之建議。青木繁的指導反映1932年之後日本國際地位的孤立，學生論文由熱帶殖產學知識之建構，轉向熱帶林木研究。1937年之後，田添元教授運用北海道經驗指導學生植物根系與適溫研究。1939年之後偏重戰時物資相關之熱帶林木。⁴⁸

日治時期是臺灣水產教育的發軔期，培養不少近代臺灣從事海洋發展的先驅，成為戰後初期臺灣水產界的中堅人物。過去對戰後的漁業技術人才曾有專文，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水產教育：以師資分析為中心〉彌補了日治時期的論述。其研究指出，1922-1945年間臺灣先後有七所水產學校成立，其師資結構和素質實與日本國內相似，而別具特色。1930年代前後起，水產補習學校師資即以北海道帝國大學水產專門部畢業生為主體，除顯示水產學校師資素質的整齊，札幌系也在臺灣的水產教育中居主導地位。多數教師具專業經歷，能以實務經驗用之於教學工作。他們一方面編寫適合臺灣的教材，帶領學生前往各水產試驗機關、水產會社、水產市場等進行見習和實習；另一方面經常接受總督府委託，從事臺灣水產的試驗、調查及研究工作，並隨時發表其調查研究成果，呈現出教學相長之一面。⁴⁹

殖民科學被視為是近代科學知識建立和傳播的重要一環，過去的論文多以單一帝國為主軸探討知識的增進，而忽略跨國的交流，尤其是新興帝國的日本如何向其他歐美帝國取經與互動？葉爾建〈20世紀初日治臺灣與美屬菲律賓的農業知識交流——以臺灣新式牧牛業為例〉，以《臺灣農友會報》、《臺灣農事報》與《菲律

45 張耀宗，〈知識轉型：日治時期農業知識的轉變〉，《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7:1（2014）：61-83。

46 林啟揚，「臺灣蠶業的現代化：以日治時期蠶病預防為起點」（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47 呂紹理，〈從螟蛉到螟害：近代臺灣的農業蟲害及其防治〉，《臺大歷史學報》56（2015）：133-188。

48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之造林學研究——以林學科學生畢業論文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9（2013.6）：207-260。

49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水產教育：以師資分析為中心〉，《國史館館刊》41（2014.9）：43-75。

賓農事報》(The Philippine Agricultural Review) 作為分析文本，討論臺灣與菲律賓的牧牛業知識交流。作者指出日本與美國兩個殖民國家對熱帶殖民地的資源皆須經過摸索、嘗試與掌握階段，知識交流應運而生，其交流方式表現在種畜品輸入、飼料作物、牧草的流通和牛疫防遏制度的借鏡等。作者認為殖民時期的知識生產與交流具有跨帝國與多重網絡現象，雖然臺灣向菲律賓的知識學習較多，呈現出不均衡的交流。⁵⁰ 因為《菲律賓農事報》偏重對臺灣牧牛業狀況的報導，較少科學知識的借鏡，這種交流的層次意義為何？是否只是為了購買臺灣牛隻所做的實況參考？臺灣總督府是否充分運用他山之石於牧牛業中？皆可進一步詳論。

曾獻緯《戰後臺灣農業科學化的推手——以農業推廣體系為中心(1945-1965)》是作者2013年的碩士論文修改出版。作者在畢業後陸續以碩士論文為基礎，發表〈戰後初期臺灣農業推廣組織的接收與重整(1945-1949年)〉、〈戰後臺灣稻作技術的推廣(1945-1960年代)〉兩篇期刊論文。而這兩篇論文也彙整於專書中。作者詳述戰後日治時期的推廣制度一再更迭，最後回到日治時期的農會體系的過程。戰後的推廣匯集多方組織，有縱向繼承日治時期的農會與農事小組，橫向移植中國農會的經費管理，隨美援引進的四健會，自我創造與轉化的農事研究班，四個組織比次交互關聯，使臺灣農業推廣體系呈現多源與多元的樣態。作者另以稻作討論農業科學化的成效，認為其發展乃建立在戰前的基礎上運作，內容則受供給面肥料的影響，進而逐步改變農民的耕作習慣。⁵¹

六、組織、政治與社會

建置於日治時期的農會、產業組合，在戰後農村社

會依然發揮其影響力，它們與地方社會與基層金融關係緊密，長久以來是農業史關注的焦點。這部分有3篇論文，討論日治時期的產業組合與農民、戰後產業組合與農會的分合、制度變遷等，除了更細緻地分析農業組織與農民關係，也究明這些組織在戰後分合原因。戰後，臺灣農業歷經接受外援、援外到技術合作的過程。這部分有一本探討四健會與美國青年交流的專書，一本討論與泰國及越南農業外交的碩士論文，一篇檢討對沙烏地阿拉伯農業技術合作的期刊論文。將這三種作品合併閱讀比較，有助於對農業外交與技術外援更深層的瞭解。最後，農業在歷史的長河中，對地方社會與文化必當產生深遠的影響，有諸多論文從階層關係、農場、聚落樣貌、農村影像等角度探討其流變。

(一) 農業組織

產業組合與臺灣農村生活息息相關，林蘭芳〈日治時期產業組合與臺灣農村〉認為此一制度性建置成為農村新的基礎性結構，組合員得以借貸農業或生活資金。不同組合提供農民使用的農用資材，改變清代以來的農業經營。戰爭時期，產業組合亦為官方動員之機制，不僅增產報國，連學習日語都有它的官式色彩。戰後，產業組合又成為新政府從事組織動員的工具，影響深遠。⁵²

李為楨〈1910-40年代臺灣農業組織制度變遷之考察：以產業組合與農會為中心〉指出日本統治時期的農會與產業組合與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的合作社發展有極大差異，戰時農會與產業組合統合到農業會的過程更是國民政府未有的經驗。戰後的改組並非能輕易適用於國民政府時期的法律，造成戰後農會與合作社歷經組織分合的過渡。⁵³ 黃仁姿〈農會的檔案與歷史：以戰後農會與合作社分合的派系紛爭為例〉認為農會與合作社分合

50 葉爾建，〈二十世紀初日治臺灣與美屬菲律賓的農業知識交流——以臺灣新式牧牛業為例〉，《漢學研究》32: 2 (2014.6): 119-138。

51 曾獻緯，《戰後臺灣農業科學化的推手——以農業推廣體系為中心(1945-1965)》(臺北：國史館，2015)。

52 林蘭芳，〈日治時期產業組合與臺灣農村〉，《新眼光：臺灣史研究面面觀》(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13)，頁381-424。

53 李為楨，〈1910-40年代臺灣農業組織制度變遷之考察：以產業組合與農會為中心〉，《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211-243。

案，表面上看起來是依法行政或因地制宜的便宜行政之爭，但實際上背後卻牽涉國民黨的派系鬥爭，也就是主張農會、合作社獨立分開的 CC 派與主張兩者合併的陳誠之間的角力。⁵⁴

（二）政治外交

在農業政治外交上，林杰民《中華民國四健會的成立與臺美青年交流（1951-1965）》說明四健會在美國的發起與傳播，中國的農業推廣經驗，美援下的四健會引進發展，國際農村青年的交流計畫，擔任臺灣與美國草根大使（IFYE）的成員與其活動，並檢討交流功能與局限。作者以中國農業推廣經驗，農復會的臺灣農村研究調查，說明四健會並非機械移植，而是具有臺灣特色的鄉村青年組織。本書蒐集了相當多的草根大使資料，追蹤他們在美國與臺灣的活動，投入草根大使工作的心路歷程，比較臺、美兩國青年的志趣，草根大使在農業之外之政治外交表現，頗為生動活潑。⁵⁵

1959 年，農業技術團在美國政府經費支持下，派遣越南農技團，開啟我國參與國際援助之先河。林書吟「戰後臺灣對泰國和印尼的農業援助」說明援助兩國的背景，以及從援外到合作的關係轉變。作者也比較兩國援助型式的不同。泰國原本就是東南亞糧倉，我國對其援助的部分在掃除泰北的罌粟，協助其轉植果樹、園藝作物及灌輸水土保持觀念。對於農業環境與發展不如泰國的印尼，則從協助推廣多項作物、水產養殖技術、農業企業經營、開設研習班建立其基礎著手。⁵⁶

農業技術援外的成果如何？陳思賢〈中華民國對沙烏地阿拉伯實施農業技術合作過程與影響（1965-1971）〉檢討農耕隊的外交效益。作者以本來想要在沙烏地阿拉伯推廣的臺中在來一號為例，雖然該品種相當適應該地氣候，卻未受到青睞。作者認為 1970 年中華民

國退出聯合國後，農耕隊留在沙烏地阿拉伯，農耕外交實際功能在證明中華民國存在之事實。⁵⁷

（三）農業與社會

臺灣總督府透過國家力量，將農業知識普及農村，以臻農業科學化之目的。過去，學術界對日治時期農業技術改良的研究重點在農事試驗場或農事機構的運作，強調國家推動角色，農村社會以什麼態度接收農業新知並運用到農事中？是否具有選擇的意志？黃俊昌「日治時期臺灣的農事改良政策與農村社會」討論技術下鄉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作者以臺灣農友會的成員與地方社會的接觸說明總督府將農業技術導入農村的過程。另以屏東萬丹為例，討論水利發展與稻米轉作，並以李劣成為篤農家的過程，說明總督府如何運用社會資源，以及當地社會如何視自己的需要，因應總督府的需求，在雙方互取所需的情形下進行農事改良。⁵⁸

坑口農事自治村是日治時期著名的農業模範部落，在林獻堂與日本當局合作下，先後推行各種愛佃設施。李毓嵐〈林獻堂的愛佃設施——坑口農事自治村〉以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為主要史料，闡述坑口農事自治村為佃農進行的包括契約、水路、肥料、農期保育園等合理農業措施，分析地主與佃農的互動情形。但文中也提醒愛佃措施其實對當時急速成長的農民權利產生了催眠效果，並將農民拉回鄰保互助，由國家掌控的狀態。⁵⁹

在族群與農業方面，吾人多將茶葉與客家人做不二聯想，這樣的關係在鳳山流域是如何發生的？鳳山溪流輸出商品中，茶與樟腦皆高度仰賴交通與市場網絡，張翰璧與徐幸君〈客家區域與客家經濟的動態關係——以鳳山溪茶產業為例〉以《工場名簿》、臺灣人物誌資料庫整理出新竹州的茶產業，製茶人士背景，從

54 黃仁姿，〈農會的檔案與歷史：以戰後農會與合作社分合的派系紛爭為例〉，《檔案季刊》13:1（2014.3）：60-73。

55 林杰民，《中華民國四健會的成立與臺美青年交流》（臺北：國史館，2014）。

56 林書吟，「戰後臺灣對泰國和印尼之農業援助」（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

57 陳思賢，〈中華民國對沙烏地阿拉伯實施農業技術合作的過程與影響〉，《臺灣文獻》64:2（2013.6）：76-116。

58 黃俊昌，「日治時期臺灣的農事改良與農村社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59 李毓嵐，〈林獻堂的愛佃設施：坑口農事自治村〉，《新眼光：臺灣史研究面面觀》，頁425-454。

中觀察客家比例，貿易網絡型態等。結果顯示，當地茶業並非客家人引進的產業，因為自然環境的適宜，市場經濟需要，政策支持及客家茶農與商人持續投入，才使茶產業和客家在鳳山溪流域形成緊密的關係。⁶⁰

彰化的源成農場在三五公司的愛久澤直哉、私營移民、二林蔗農事件等議題中已多被討論。柯光任的〈日治時期彰化源成農場的成立與發展〉運用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的畢業論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與古今照片，補充了源成農場的位置面積、農場管理、移民與米糖生產。⁶¹

高汝君「嘉義農業的發展與變遷」指出嘉義都市農業發展的趨勢乃由糧食作物轉向嗜好作物，自給性高的農業變成商業性取向。⁶² 莊淑姿《山城包娜娜：旗山香蕉產業與地區發展》，將旗山香蕉產業放在臺灣香蕉經濟脈絡下，敘述該產業之興衰，對地方社會文化的影響。⁶³ 雖然書中介紹日治到戰後香蕉的整體產業變化，但旗山為何發展香蕉產業？如何推廣？文中所列的廟宇、建築等資產與香蕉有何關係？文中並未清楚說明，反而無法凸顯香蕉在旗山的意義。

黃煥淋「日治時期影片《幸福的農民》之農村影像研究」以拍攝嘉南大圳事業為推廣目的的 28 分 7 秒黑白影片為分析文本，此影像由官方色彩濃厚的臺灣教育會製作，提供珍貴的農村民俗紀錄。作者指出畫面以積極接受殖民而富裕的直順庄對比農穫歉收的後善庄，突顯建設嘉南大圳所帶來日本殖民的優良成果。總督府選用「漢字」字幕來普及宣傳，更藉由頒獎表揚「幸福的農民」的阿仁影像，彰顯殖民者特殊的武士道的精神。⁶⁴

七、結 論

臺灣雖是蕞爾小島，但三百年來卻從米糖、山產、

軍需特作、香蕉、養豬、草蝦與養殖業到花卉的經營中，展現農業發展的多樣性。而 2013 至 2015 年的研究成果為各階段的農業發展做了相當豐富的註解。

(一) 時空延展與農業的國際性格

雖然日治時期仍為研究主力，但戰後的資料取得與文字解讀便利，成果累積也相當快速。荷蘭時期與清代的論文產出相對緩慢，但有相當優質的稻作品種、糧食、鹿皮、漁業、水果作品產出。某些議題，例如糧食，透過不同研究者的個別書寫，已粗略呈現三百年的變遷。

就地域上，不僅出現濁水溪沖積扇平原與鳳山溪流域進行跨地域的觀察，且大幅度地展開與東亞、美國、沙烏地阿拉伯交流互動的分析。臺灣的島外關係首先表現在農產品貿易上，除了討論日本本土商人對臺灣農產的接應買賣，也處理了琉球、東南亞的農產交易；與東南亞的帝國進行殖民知識交換，或從交易的角度凸顯荷蘭人在臺灣種植稻米及米食的飲食習慣；從農業外交的角度探討戰後臺灣與反共國家的關係等。1950-1960 年代的戰後復原，在農業團體與農業推廣的接收與重組課題上，皆開始與中國各種農業體制比較，在制度史建立基礎。以上種種，皆可透過農業彰明臺灣在不同階段，在東亞的歷史定位與國際性格。

(二) 知識跨域與合作

日治時期，總督府挾帶科學知識發展農業，農業成為科學實驗的產物，日治農業史料也常帶有這些特點；戰後農業受到美援影響，導致這兩個階段的農業史討論帶著新知識與新思維。從事農業史寫作的學者，莫不殫精竭慮突破閱讀的障礙，詮釋這些兼具人文與科學的文獻，在學術史上有其貢獻。近幾年來，有不少經濟、農業、工程學者也從社會文化角度書寫屬於他們專業領域

60 張翰璧、徐幸君，〈客家區域與客家經濟的動態關係——以鳳山溪茶產業為例〉，《客家映臺灣——族群產業與客家意象》（苗栗：桂冠圖書公司，2015），頁57-99。

61 柯光任，〈日治時期彰化源成農場的成立與發展〉，《彰化文獻》20（2015.10）：3-32。

62 高汝君，「嘉義市都市農業的發展與變遷」（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5）。

63 莊淑姿，《山城包娜娜：旗山香蕉產業與地區發展》（高雄：麗文出版社，2013）。

64 黃煥淋，「日治時期影片《幸福的農民》之農村影像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的農業技術史。有的採取人文、農工跨領域團隊攻略，這三年出現了機械、動物及推廣層面的農業史。學術界之外，農委會、農漁會、水利界皆挹注人力、經費整理史料，撰寫通史，在各級機關團體支持下，出版甚速。另外，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著力角度大不相同，歷史學界在日治農業推廣制度上的研究成果，或者可以成為經濟學者的參考。

（三）學術薪傳與隱憂

本文所討論這三年來的農業課題範圍內的碩博士論文共 16 本，博士論文只有 1 本，顯現博士培育速度減緩之現象。過去農業產業領域幾乎是碩士研究生的天下，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年單一產業論文減少，可能與主要作物開發殆盡有關。以單一農產為主的學位論文漸漸趨向產業與地方社會的聯結，且以文化或觀光產業相關系所投入最多，這些論文多企圖找出當今地方社會發展背後的產業因素。雖然挖掘了不少地方故事，對區域史的建構與推廣有所幫助，但部分論文的史料回顧與應用囫圇吞棗，析論不精，引用太多網頁資料，有流於人云亦云的弊病。

（四）地方文獻與產業文化

農業直接影響人們生活，形塑出獨特的地方文化，包括農村、漁村與山林小鎮。地方政府提倡地方學的氛圍下，挹注經費在文獻歷史保存，諸多地方文獻期刊紛紛出版產業專號。其論文關照地方產業，以實地田調口訪，詳述發展過程與人地關係，跳脫傳統文獻史料之限制，建立農業與地方社會、休閒文化發展的歷史關連性。但地方文獻刊物的出版必須考量普及與通俗，細膩的歷史脈絡書寫與史料考證無法兼顧，偶有引註不精，或使

用「據說」來源之現象。如何在學術與通俗兩者平衡下，將地方的活歷史變成歷史研究資源，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五）未來展望

2013-2015 年的研究使農業史再創高峰，這個成績來自於對舊議題的重新檢視，或縱向溯源，或橫向跨域觀察，論述更加細膩。例如：近代東亞是諸多帝國競逐之地，從上述研究可以瞭解其彼此之間也曾觀摩學習，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比較仍有相當多的耕耘園地。過去對日本殖民的治理與產業政策多持肯定評價，然而官營漁業移民、罌粟、蠶業的栽植點出了日治時期諸多農業項目經過摸索、嘗試、不如預期、轉型或失敗收場。因此，總督府的治績實需有再重新檢討的必要。近年來跨域人流研究熱烈，當時所帶來的物流變化應該也是可以期待的。

這三年在農業外交的研究成果上頗有斬獲，而透過這個基礎，進行戰後臺灣的東南亞水利、品種或非洲糧食問題的改善研究，都是可行的探索方向。林業外交方面，戰後除農技團外，林務單位也協助邦交國森林利用、植物園興建、山坡地水土保持等，皆值得討論。

農業知識的建構與傳播是這幾年熱門的課題，由於其牽涉到清代文人紀錄的習慣與邏輯，日本殖民者熱帶知識的瞭解，或有意識地傳播製造出來的動植物觀念等。吾等大量使用這些史料建立農業史，瞭解史源有其必要。然而，畢竟農業史牽涉到跨領域知識的應用解讀，未來如果能史學與農學界雙劍合璧，必能有更多的突破。最後，50 年代雖然較日治時期近，但史料流失不見得較慢，戰後的向下延伸，建立史實亦刻不容緩。